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部建设的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丁冀荣<sup>\*1</sup>, 杨晨茜<sup>2</sup>

(1.江西省生态文明研究院,南昌 330036;2.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摘要】**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增长惯性与生态约束的冲突”“区域共生需求与行政壁垒现实的博弈”“绿色转型迫切性与支撑能力的落差”等现实挑战。本文剖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部建设的内在逻辑——“生态价值论”确立历史方位与战略定位、“生态协调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生命共同体”统筹构建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生态治理论”完善制度与实践逻辑;并结合国家及地方政策需求,提出具有操作性对策:一是构建全域协同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推进重点生态区域生态系统修复、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完善生态保护制度与法治保障;二是推动产业与能源结构系统性转型,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培育壮大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能源结构与能源高效利用;三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健全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体系、发展生态友好型特色产业、完善生态价值转化保障政策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美丽中部;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88X(2025)05-0087-08 DOI:10.19758/j.cnki.issn1673-288x.202505087

##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中部地区崛起必须是绿色崛起,要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强调,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的长远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中部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多样的生态类型,在全国生态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肩负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洪水调蓄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生态功能。然而,长期以来,作为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制约了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深

入探究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部建设,对于助力中部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部建设的内在逻辑

### 1.1 “生态价值论”确立美丽中部建设的历史方位与战略定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价值论”,明确了美丽中部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

从历史维度看,中部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生态变迁始终与区域文明进程紧密交织。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曾导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农业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历史上,黄土高原地区受土质疏松、地形破碎、降雨集中等因素影响,土壤侵蚀强度

基金项目:民进江西省委会 2025 参政议政项目“应用数字技术破解江西‘两山’转化堵点难点的对策建议研究”(2025-122)。

作者简介:丁冀荣(1996—),男,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政策,E-mail:15079081876@163.com。

大,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使黄河下游河道淤积、频繁泛滥改道,黄河周边地区的农田被淹没,许多农业聚落被迫迁移,农业文明发展遭受重创。长江中游的湿地退化打破了流域的生态平衡,影响了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长江中游湿地退化,使水资源调节能力减弱、洪涝灾害频发,原本依赖湿地资源的渔猎活动难以为继,同时也不利于开垦农田、发展灌溉农业,阻碍了文明形态的顺利转变。历史经验反复印证,生态状况是文明存续的根基,中部地区的生态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现实维度看,作为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粮食生产基地,中部地区的生态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全局。中部地区 2021—2024 年水土流失面积及其在全国占比等变化情况(详见图 1)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战略定位的必要性与实践成效:中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从 1609.7 万公顷降至 1531.2 万公顷,占全国比重从 6.02% 降至 5.88%,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长江中游生态修复等工程有效遏制了生态退化趋势,为农业生产筑牢了生态基底;森林面积从 3620.5 万公顷增至 3874.6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 35.22% 提升至 37.69%,不仅增强了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生态功能,还通过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为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提供了支撑。“生态价值论”的深层机理在于:生态的价值不仅体现为直接的环境效益,还通过支撑农业生产、保障资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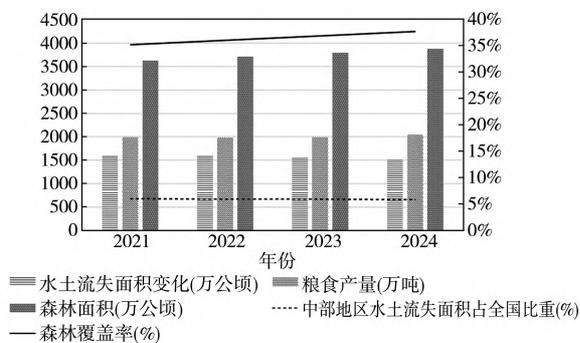


图 1 2021—2024 年中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其在全国占比等数据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水土保持公报》,各省生态环境厅、水利厅等。

给、调节气候等方式,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中部地区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将生态保护上升为关乎区域永续发展、国家战略全局的核心议题,通过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 1.2 “生态协调论”破解中部地区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论,为破解中部地区“发展需求与生态承载限制”矛盾提供了指引。

从实践轨迹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强度持续降低,实现了“能耗下降、污染减少”与“能源供应稳定、经济稳步增长”的协同。如图 2 所示,2021—2024 年,中部地区新能源发电量占比从 11.3% 稳步提升至 17.6%,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同步增长,这反映出中部地区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正通过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将“生态承载限制”转化为能源结构升级的动力;单位 GDP 能耗降至 0.43 吨标准煤/万元,原煤消费量下降率保持在 6% 以上,这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强度持续降低,实现了“以更少资源消耗支撑更多经济产出”的良性循环。这些数据变化印证了“生态协调论”的实践机理——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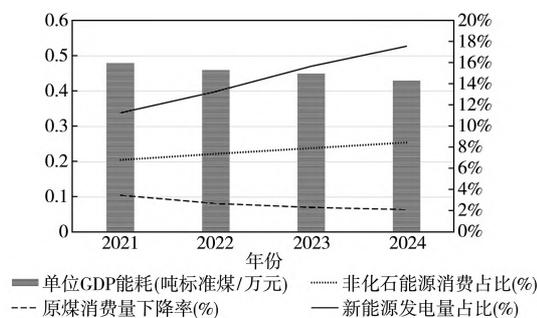


图 2 2021—2024 年中部地区单位 GDP 能耗等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防科工局等

通过系统性变革让绿色发展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纽带。

从理论逻辑看,这种矛盾破解的核心在于对“发展与保护”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传统模式将生态保护视为发展的“成本”,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中部地区认识到,生态承载限制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既能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与污染排放,又能通过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培育新能源等绿色产业,既能减少污染排放,又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约束—转型—增效”的脉络链条,打破了“保护必然牺牲增长”的固有认知,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对立”走向“共生”。进一步而言,“生态协调论”的深层价值在于重构发展评价体系。中部地区的实践表明,破解矛盾的关键并非放弃发展,而是改变“唯GDP论”的单一导向,建立以“绿色效益”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标准——既看经济增长速度,又看资源消耗强度;既看产业规模,又看环境影响,推动地方政府与企业从“被动应对生态约束”转向“主动拥抱绿色转型”,最终实现生态改善与经济提质的正向循环。

### 1.3 “生命共同体”统筹构建中部生态系统治理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为中部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中部地区地形复杂,涵盖山地、平原、湿地、河流等多元生态要素,且跨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四大流域,生态系统关联性强。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与长江上游的三峡库区、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构成完整的水文系统;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直接影响黄河下游防洪安全。“生命共同体”理念引导中部地区打破行政壁垒与要素分割,建立“全域统筹、上下联动、跨区协同”的治理机制。

在纵向维度,将生态保护纳入地方政府考

核体系,推动省级统筹与市县落实相结合;在横向维度,建立包括鄂豫皖大别山区生态补偿、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协同治理等在内的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解决“上游保护、下游受益”“一地污染、多地遭殃”的难题。如图3所示,2021—2024年,中部地区有关生态保护补偿的协议数量、补偿额度不断增加,生态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不断织密,从侧面反映出中部地区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在不断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力度在加大,制度保障不断巩固。此外,中部地区通过统筹江西鄱阳湖湿地保护、洞庭湖湿地恢复等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工作,强化了生态修复的整体性与协同性,推动鄱阳湖和洞庭湖总磷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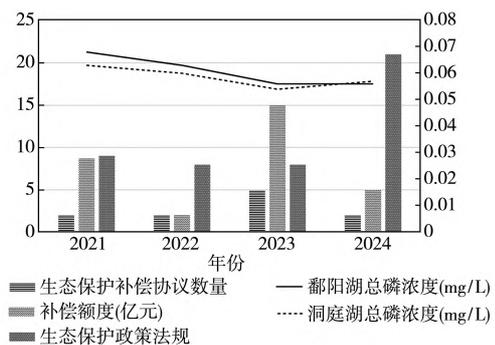


图3 2021—2024年中部地区生态保护政策法规数量等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各省份人大常委会、财政厅、生态环境厅等。

“生命共同体”理念下的系统治理机理,本质上是对生态系统关联性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中部地区多元生态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森林涵养水源、湿地调节水文、土壤支撑植被生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衡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内在关联性决定了生态治理必须跳出单一要素、单一区域的局限,以整体性思维统筹各方力量与资源,通过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实现生态系统功能的整体提升,正是中部地区生态治理实践中所遵循的重要依据。

### 1.4 “生态治理理论”完善美丽中部建设的制度与实践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严密法治

观”为美丽中部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的逻辑支撑。

从制度层面看,中部地区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为核心,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守资源利用上线与环境质量底线;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动企业从“被动治污”向“主动防污”转变;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压实生态保护责任。如图4所示,2021—2024年,中部地区河长、湖长、林长等治理主体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制度在纵向责任传导上的深化,构建起“层层负责、全域覆盖”的责任体系,使制度要求转化为常态化的治理行动。从实践层面看,中部地区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共治格局:政府通过规划引领、政策激励引导发展方向;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公众通过绿色消费、生态志愿服务参与生态建设,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美丽中部建设的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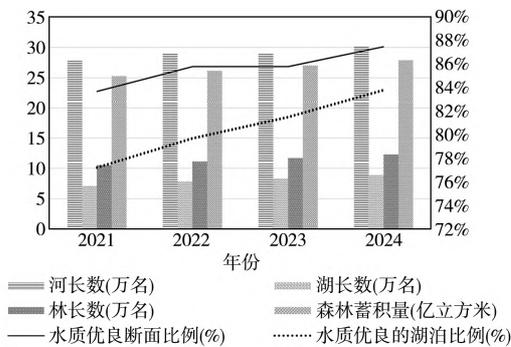


图4 2021—2024年中部地区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取得成效

注:数据来自《中国河长制湖长制年度报告》《中国森林资源报告》,各省份生态环境厅、林业局等。

从治理成效维度看,2021—2024年,中部地区水质优良断面比例、水质优良的湖泊比例持续提升,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印证了制度实践对生态质量改善的推动作用。这些变化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在最严格制度约束下,由政府监管、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等多环节协同发力产生的结果: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守住生态基底,通过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

企业责任,通过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最终形成“制度—实践—成效”的正向循环。“生态治理理论”的深层机理,在于以系统思维整合制度要素与实践力量。制度层面,既强调红线管控、损害赔偿等“刚性约束”,又注重激励政策、标准体系等“柔性引导”,形成刚柔并济的制度网络;实践层面,既明确政府的主导性,又激活企业的主体性与公众的参与性,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生态。这种“制度保障—实践协同—成效反馈”的脉络,是推动生态治理从“碎片化行动”升级为“系统性工程”的核心支撑,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系统治理”方法论的实践伟力。

## 2 当前美丽中部建设的现实障碍

### 2.1 “增长惯性”与“生态约束”的矛盾:传统发展路径与绿色转型的冲突

中部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制造业腹地和农业核心区,长期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与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形成对立。一方面,经济增长对传统产业的依赖度居高不下。如图5所示,2021—2024年,中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占中部地区GDP比重、占全国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从2021年的30.4%、24.3%,逐年升至31.6%、27.0%,但2024年全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全球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约为24.9%、15.1%。山西、河南的煤炭、钢铁产业,安徽的化工、建材行业,江西、湖南的有色金属冶炼等,仍是区域经济的“压舱石”。这些产业的低碳改造需巨额投入,地方政府在“保增长”与“降排放”间面临两难。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生态负荷。中部六省粮食产量占全国30%以上,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较为突出。2024年,巢湖流域种植业亩(1亩约等于0.0667公顷)均化肥用量比全国平均高15%,鄱阳湖周边规模化养殖场年排污量中,总磷、总氮排放量占流域污染负

荷的4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仅接近50%,生态治理压力与农业增效需求形成直接冲突。传统产业的“退出成本”与新兴产业的“培育周期”存在时间差,生态保护的“即时投入”与经济收益的“滞后性”形成张力,导致地方在短期政绩与长期生态效益间平衡难度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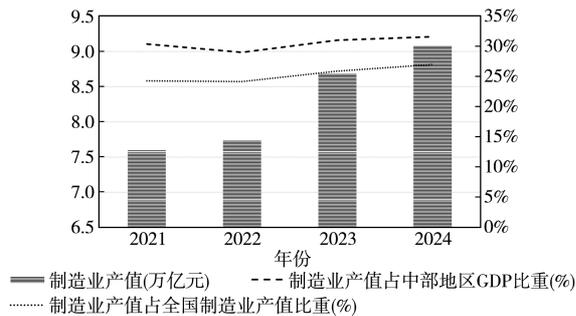


图5 2021—2024年中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及其占中部地区GDP比重、占全国制造业产值比重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各省份《统计年鉴》等。

## 2.2 “区域共生”需求与“行政壁垒”现实的矛盾:跨域治理与利益分割的博弈

中部六省虽同属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生态共同体,但因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制约着该地区生态治理的系统性与协同性。一方面,流域治理存在“上下游不同步”。虽然洞庭湖生态区地跨长江中游的湖北荆州、湖南岳阳等地,但湖北侧重化工产业扩张,湖南注重湿地保护,这导致两省的污染排放标准、治理投入力度差异显著。黄河流域的山西吕梁与河南三门峡,因煤炭开采与水土保持的优先级不同,河道清淤、水土保持项目协同率较低。另一方面,跨区域生态治理存在“内外协同失衡”。安徽融入长三角后,生态治理资源向东部倾斜;湖南、江西同步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内部协同被边缘化。例如,虽然湘赣边的渌水流域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但是湖南醴陵的陶瓷产业与江西萍乡的煤炭产业,因分属不同经济圈,其污染治理技术共享率较低,相关补偿资金到位率仅有60%。生态保护的“公共产品属

①1亩约等于0.0667公顷。

性”与地方发展的“利益排他性”存在冲突,如果缺乏统一的利益协调机制与考核体系,就会导致跨区域治理陷入“谁都该管,谁都难管”困境。

## 2.3 “绿色转型”迫切性与“支撑能力”薄弱性的矛盾: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

中部地区的绿色转型需求与其现有支撑体系存在落差,构成了重重障碍,具体表现为“三缺”。一是缺技术。如图6所示,2021—2023年中部地区研发投入强度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中部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为2.25%,低于全国约0.4个百分点,此外,2023年中部地区绿色技术专利占比仅为14.1%。在山西的煤炭清洁利用、河南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湖北的长江湿地修复等领域,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60%。二是缺资金。生态修复项目所需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地方财政难以承受。2024年河南计划治理的历史遗留矿山面积超过30万亩<sup>①</sup>,按平均修复成本8万元/亩计算,所需资金总需求达240亿元;安徽巢湖蓝藻治理每年需投入12亿~15亿元,但省级财政专项直接用于蓝藻治理的经费仅有6亿~8亿元,社会资本参与度不足20%。三是缺人才。环保领域高端人才“东南飞”现象突出,据调研,近年来,江西某新能源企业核心研发团队中的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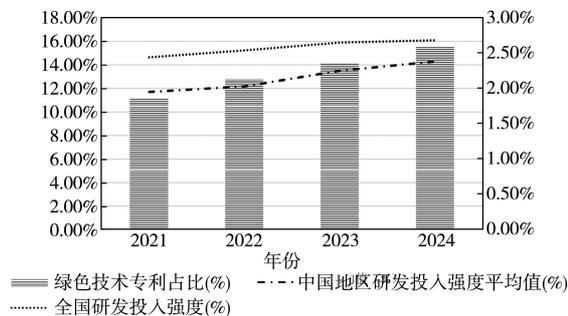


图6 2021—2024年中部地区绿色技术专利占比、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值,全国研发投入强度

注:数据来自《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等,2024年数据为预测值。

管、技术骨干大多被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高薪挖走。中部地区的“后发劣势”与绿色转型的“高门槛”形成反差,既缺乏长三角的技术外溢效益,又没有珠三角的资本优势,导致中部地区绿色转型“心有余而力不足”。

###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部建设的实践路径

#### 3.1 构建全域协同的生态保护治理体系,夯实美丽中部生态基底

以流域、山脉等自然生态单元为纽带,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完善生态补偿与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共保联治、权责明晰”的生态治理格局。一是推进重点生态区域系统修复。聚焦中部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实施整体性保护与修复工程。针对河流流域,强化落实《关于以高水平保护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实施意见》等,统筹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治理,加强长江、洞庭湖、鄱阳湖的总磷污染控制,推进黄河流域山西段、河南段的总氮污染控制,构建连续完整的水生生态廊道;针对山地丘陵区,开展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与森林质量提升行动,增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能力;针对湖泊、湿地,实施生态补水、退围还湿等措施,重点修复鄱阳湖、洞庭湖、巢湖等重要湖泊生态系统,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的调蓄功能与碳汇能力。通过系统性修复,使各类生态系统在结构上相互衔接、功能上互补协同,形成稳定的生态安全屏障。二是建立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以打破行政壁垒为突破口,构建中部地区生态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统一规划编制、标准制定与执法监管。在污染防治领域,深化汾渭平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苏皖鲁豫交界区域、长江中游三省的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建立跨区域污染预警与应急联动机制,对重污染天气实施统一预警、调度与执法;在生态补偿方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生态效益外溢等因

素,完善横向补偿等方式,平衡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地区的利益关系,确保生态保护责任与利益相统一。河南继续深化与山西等地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强化基于水质考核结果的双向补偿实施。三是完善生态保护制度与法治保障。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将红线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严格执行,严禁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损害主体、赔偿标准与修复责任,重点推进长江中游沿岸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构建覆盖空气、水、土壤、生物等要素的立体监测体系,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动态监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结合中部地区生态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为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确保各项治理措施有法可依、落地见效。

#### 3.2 推动产业与能源结构系统性转型,培育美丽中部绿色动能

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全链条转型重塑区域发展优势。一是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升级。针对中部地区传统产业占比高的特点,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动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清洁生产工艺与循环经济模式,降低单位产值能耗与污染物排放强度。湖南、湖北、江西等制造业大省强化组织重点钢铁企业与新能源产业链对接,推进跨产业协同转型;作为煤炭资源大省,山西要依托碳中和产业创新联合体,聚焦煤炭清洁利用、低碳冶金等领域技术攻关,助力传统产业升级。二是培育壮大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中部地区产业基础与科研资源,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绿色新兴产业,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发挥江西新能源产业协会与安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产业联盟等作用,推动光伏产业、锂电产业协同创新与产业链整合,打造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发挥湖南新能源汽车行业协会等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提升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的研发能力与产业集聚度。在新能源领域,加快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推动储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构建多元互补的新能源供应体系;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强化中部省域间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条,提升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研发能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在节能环保领域,培育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推广先进环保技术与装备。三是优化能源结构与能源高效利用。以“双碳”目标为引领,逐步降低化石能源占比,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化、清洁化转型。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推广力度,减少散煤使用,推进煤电联营与节能减排改造;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天然气在工业、民用等领域的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地热能、氢能等新兴能源,丰富能源供给形式。加快建设湖北等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为区域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制度支撑;加大对山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推广力度,推进煤电联营与节能减排改造。

### 3.3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释放美丽中部生态红利

立足丰富的生态资源禀赋,探索多元化价值实现路径,完善配套政策体系,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是健全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体系。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明确生态产品的产权归属、价值评估标准与交易规则,为市场化交易奠定基础。推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扩大交易覆盖范围,完善交易平台功能,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交易,通过市场机制倒逼减排降碳。探索开展森林碳汇、湿地碳汇等生态碳汇交易试点,建立碳汇项目开发、计量、核证等标准体系,推

动生态碳汇进入全国碳市场。继续探索河南等地参与碳市场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开发林业碳汇 CCER 项目,探索油茶碳汇等方法学。二是发展生态友好型特色产业。依托中部地区的森林、湿地、湖泊等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有机农业等特色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在生态旅游方面,打造一批高品质生态旅游景区与线路,开发徒步、露营、观鸟等生态旅游产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实现“生态观光”向“生态体验”升级;在森林康养方面,利用优质森林资源建设康养基地,提供养生度假、康复疗养等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在有机农业方面,推广绿色种植、养殖模式,培育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生态+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例如,安徽联合浙江打造新安江—千岛湖旅游通道,整合生态与文化资源推动生态旅游升级;江西继续支持宜春、新余、赣州打造锂电产业核心区,同时依托森林资源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等。三是完善生态价值转化保障政策。加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顶层设计,制定专项规划与配套政策,明确部门职责与推进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依托长江流域赣皖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深化江西—安徽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将生态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挂钩,激励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研发,推广生态监测、污染治理等先进技术,为生态产品价值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 参考文献:

- [1] 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规律论的继承和发展[J].理论视野,2019(11):48-53.
- [2] 毛华兵,闫聪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J].学习与实践,2020(07):5-12.
- [3] 沈晓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湖南[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4,49(01):6-8.

- [4] 王辉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山西建设[J].前进,2024(06):44-46.
- [5] 王蒙徽.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2,47(06):27-32.
- [6] 崔春生.基于 Vague 集的中部五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J].管理评论,2017,29(08):243-250.
- [7] 谷树忠,胡咏君,周洪.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35(01):2-13.
- [8] 吕忠梅.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J].当代法学,2021,35(06):3-17.
- [9] 郝兆印,王成新,白铭月,等.“两山论”:人地关系理论的中国实践与时代升华[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03):136-144.

## The Inner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Beautiful Central China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NG Jirong<sup>\*1</sup>, YANG Chenxi<sup>2</sup>

(1. Jiangxi Research Academ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anchang 330036, China;

2.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barrier, grain production base, and energy and raw material base in China, the central region,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However, it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growth inertia and ecological constraints”, “the game between the demand for regional symbiosis and the reality of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urgency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upporting capac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entral region—the “ecological value theory” establishe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e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theory” solv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he “community of life” coordin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system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ory” improves the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logic. 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it puts forward operational countermeasures: First, build a full-domain coordinate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 the systematic restoration of key ecological areas, establish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impro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ystems and legal guarantees. Second, promote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nd energy 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ultivate and strengthen gre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optimize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efficient energy use. Third, innovate the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market-oriented trading syste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develop eco-friendly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improve the guarantee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valu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autiful Central Region; intrinsic logic; practical path

(责任编辑 安祺)